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李源澄

儒學論集

李源澄 著
王川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李源澄

儒學論集

李源澄 著
王川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特約編輯:賀思總
責任編輯:莊 劍
責任校對:高慶梅
封面設計:墨創文化
責任印制:李 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源澄儒學論集 / 王川選編.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0. 3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ISBN 978-7-5614-4788-8

I. ①李… II. ①王…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55814 號

書名 李源澄儒學論集

著	者	李源澄
選	編	王 川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4788-8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張	41.25
字	數	8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 001~1 500 冊
定	價	125.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
聯繫。電話: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總序

編委會

一

儒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孕育於古老的中國文化，也深刻地影響和作用於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和社會。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私學，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形成“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漢書·藝文志》）的儒家學派，開啟了古代中國學術文化的“軸心時代”。儒家創立伊始，即具有以六經為代表的文獻體系，以“仁義”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以“順陰陽、明教化”為功能的價值體系，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正宗的信仰體系和以孔子為祖師的學派特徵。一句話，儒學一開始便具有豐富的學術內涵和明顯的治世功能。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以布衣之身而有非凡之思，他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六經”，託茲舊籍，寓以“仁義”、“誠信”、“中庸”、“忠恕”之精神，創立儒家系統理論，為人楷模，垂教萬世。從此之後，經過孔子整理刪訂的中國上古典籍，就成為儒家淑世濟人的經典教材。六經（後世演繹為十三經）既是儒家覺世牖民的教典，也是歷代學人闡發儒家思想、寄託慧心玄思的安身立命的經本。歷代學人的智慧結晶和辛勤著述，構成了數以萬計的以十三經為主體的儒學文獻體系。以孔子刪訂六經為標誌，中國前此兩千五百年的上古歷史得以講明，後此兩千五百年中華民族的智慧得以啟迪。六經是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橋梁與指南，也是認識、研究中國上古、中古和近古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讀本和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六經就無法講解中國的古代歷史，離開孔子就無法



認識中國的古代社會。

戰國時期，孟、荀繼起，“學”、“思”二派，角力爭先，或暢言“仁義”，或肆談“禮樂”，儒學思想體系和理論構建漸趨完備，於是儒學成為領先諸子而又啟迪諸子的一代“顯學”。繼而秦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儒學遭遇禁錮，儒生備受打擊。漢初布衣將相，厚重少文，崇尚“黃老”，實行“無為”，儒學於是一度消沉。至董仲舒、公孫弘出，儒學包容諸子而又取代諸子，頓顯其治國安邦、訓世覺民之新姿態。漢武帝推行積極有為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遂成為當世“國教”，儒家“忠孝”、“禮義”、“仁民”、“愛物”等理念逐漸滲入政治、經濟等民生領域，發揮其端正民心、諷喻世教的作用。自此之後，兩千餘年，後儒沿波，各呈意態，直至晚清，儒家思想一直是指導古代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倫理的指南北斗。儒家學說作為中華學術的主流和正宗，也一直是中國古代教育和科舉選士的主體內容。從中央的太學（或國學），到地方學府（府學、州學、縣學）和民間書院，儒家經典及其思想都得到了認真傳授和大力闡揚。誦習儒家經典，踐履儒家倫理，提倡忠孝仁義，服膺《詩》、《書》、《禮》、《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追求君子人格，實現信義和平就成了歷代有識之士矢志追求的理想人生，也為民衆樹立了判斷是非的千古不易的準繩。

一部中國歷史，既是儒學不斷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歷史，也是儒學在這一歷程中接受各種文化回饋、應對各種需求（甚至挑戰），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歷史。歷代統治者，無論是出於維繫萬世基業的需要，或是出於治世牧民的考慮，大多繼承和發展了自西漢以來形成的以太學（或國學）、郡國府州縣學傳播儒學，以察舉或科舉選拔人才的制度。並對儒經的闡釋、儒學理論的發展、儒家學說的實踐，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貫徹，傾注心力，提供條件，形成了風格獨特、千古一系的以儒學文獻、儒家經學、儒家學術、儒學思想、儒學文化、儒學倫理等為內容的有機學術體系，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和中堅。儒學在教育士子、鑄造民族性格、豐富祖國文化、形成中國特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儒學，既是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統思想和實踐倫理，也是自身具有系統理論、豐富內涵和博大文獻的經典之學、系統之學。它既是治術和學術，也是政典和教典；既是中國人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國人的主體思維。它與佛、道二教以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一道，構成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自兩漢以迄晚清，概莫能外。回顧歷史，服務未來，作為中華胄裔的當代學人，又焉能妄自菲薄，數典忘祖！

二

歷史降至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儒學一花獨盛的歷史瞬間成為明日黃花。列強進逼，“西學”東漸，中華民族信守了兩千餘年的核心價值觀念搖搖欲墜，



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家園也隨之分崩離析。孔廟被拆，書院轉制，尤其是民國初年全盤接受西方教育體制，儒家經學從教學計劃中被刪除，儒家思想在學術領域被批判。從此之後，中國的教育界很難看到儒家經學那熟悉的身影，中國的學術史上也再沒有儒家神聖的地位。漸漸地，也是令人痛心地，中國儒學被醜化，被虛化，被肢解，甚至被遺忘。更有甚者，儒家經典被指為偽書，儒學文獻被誣為垃圾，儒學倫理被拋諸腦後，儒家學說被掃地出門，實為空前所罕見、亙古之未有！中國儒學在自己的國度裏頓時成為游魂野鬼，了無“血食”、“寄身”之所！現行的所有學科設置、圖書分類和項目管理體系中都沒有中國儒學的地位！

回顧二十世紀與中國儒學有關的學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五種類型：一是對儒學及其經典持懷疑和反省態度的“疑古派”；二是對儒學及傳統文化抱反對和決絕態度的“反孔派”；三是對儒學抱發展和改造態度的“新儒家”；四是突出儒學的信仰價值，必欲變儒學為宗教的“孔教派”；五是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純學術研究的“研孔派”。

“疑古派”和“反孔派”在二十世紀初期曾經是中國學術的主流，至六七十年代“文革”時達於高潮。他們非毀詩書、鄙視仁義、拋棄禮樂、懷疑經典、批判聖賢、叛離傳統，視儒學為一切腐朽落後的總代表，恨不得將儒家經典“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在對待“中國儒學”學科建設和學術傳承與發展等方面，自然不感興趣。他們之中雖然不乏“著作等身”之人，但從建設角度看，卻是“風疾馬良，去道益遠”，南轅北轍，乏善可陳。

出於對疑古、反孔的反動，“新儒家”運用近代西方思想學術來更新儒理、發展儒學，必欲使儒學適應並服務於當代和未來社會，此亦古來儒學發展未有之新境界，從而促進了儒學學理的自身建設。“孔教派”從宗教的角度審視和發展儒學，他們借鑒西方宗教理念，必欲將儒家發展成儒教（或孔教），對加強儒學信仰、完整保存儒學自身體系有所助益。“研孔派”則從純學術史角度，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研究和考述，對認識儒學的本來面目、歷史狀況大有裨益，客觀上為恢復“中國儒學”的完整性提供了幫助。下面即簡述後三派的主要活動。

二十世紀初期，劇烈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儒學遭受空前大難，雄峙東方兩千餘年的儒學大廈轟然坍塌，儒學統治中國的時代遽然終結，嚴格意義上“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的傳統儒家已經不復存在。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梁漱溟等人挺身而出，為孔子辯護，揭起儒學復興的旗幟，成為“現代新儒家”的前驅。隨後，經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以及馮友蘭、賀麟等學人的不懈努力，“現代新儒學”發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潮之一，在學理上帶來了儒學的革新，形成“新理學”、“新氣學”、“新心學”、“新實學”等新儒家學派，大大提昇了民族自信心，為當時的民族自強以及隨之而起的抗日救亡運動注入了新鮮空氣與活力。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去市場，於是轉移至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延續其生命，主要代表人物有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方東美等。他們以接續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有感於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他們深情地呼籲：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應該完好地保留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國民精神。他們著書立說，四處講學，身體力行，宣傳儒理，在世界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最具影響的活動是共同簽署和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書》，即“中國文化宣言”。

七八十年代，是現代新儒學的復興期。從1980年起，後現代主義思潮流行，認為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實用主義等片面強調工具理性，忽視價值理性和對人的終極關懷，有損於人類幸福和長久和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儒家資本主義”概念的流行。中國大陸蠻橫無理的“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使得大陸部分學人與香港、臺灣地區現代新儒家聲氣相通，從而推動現代新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不管其政治主張如何，現代新儒家積極謀求儒學現代更新，主張中華文化的自我本位，喚醒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同時也為儒學現代更新和發展作出了積極思考，這無異於使儒學這棵千年古樹催生出無數新枝嫩芽，展現出無限生機和光明前景。

“孔教派”從觀念上講，往前可以追述到明末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後引起的中西文化和信仰之爭，而“孔教”一詞的正式提出則始於二十世紀初廖季平、康有為、陳漢章等人。廖氏出於對孔子的尊大，正式發表《孔教哲學發微》，提出以孔教統天下一切學術；康氏則有感於維新變法失敗、西學大量東漸，以為是中國缺乏宗教信仰所致，於是發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認為定孔教為國教，使“人心有歸，風俗有嚮，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其弟子陳漢章等人起而和之，成立孔教學會和孔教學院，於是“孔教”形成一時熱門話題。至八十年代，任繼愈先生再提儒教問題，其弟子李申更撰著《中國儒教史》、《儒學與儒教》、《中國儒教論》等系列專著，將這一討論推向深入。這一問題在海外也有激烈的爭論，至今方興未艾，其觀點也是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他們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具有超越性和終極性，也具有其他宗教性因素，在中國歷史上起到過宗教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儒教與其他宗教不同，它只是道德教、人文教，肯定儒學仍然有現代意義。當然，也有人認為儒學是封建社會的宗教，已經成了博物館的歷史收藏物，從而否定儒學仍然具有現代意義。

“研孔派”則多半是在儒學信仰得不到滿足情況下的轉型，章太炎曾論清學曰：“多忌，故歌詩文史楷；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善矣！”“研孔派”的作為正與之相似，不過

不是“說經”，而是“說史”了。這一派中，老一代學人如蒙文通、白壽彝、金景芳、張岱年等先生，大多走過“由經學而史學”的道路，他們早年在儒家經學、孔學、易學以及宋明理學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隨着經學學科退出歷史舞臺以及近代教育的轉型，這批學植深厚的專家學人，不得不將精力轉入純歷史的或儒學史、經學史的研究，角色也從當初的信孔、尊孔轉為研孔，即使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不忘為孔子和儒學說幾句公道話。改革開放後，從1979年始，在中國大陸逐漸形成研孔熱潮。1985年在中華孔子研究所（中華孔子學會的前身）成立會上，張岱年慎重宣佈：“盲目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批孔的時代也過去了，現在應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研究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此後研孔文章日益湧現，研究專著越來越多，特別是具有革命家、教育家雙重身份的匡亞明先生出版了《孔子評傳》，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嚴密的邏輯、新穎的見識、深刻的分析，塑造了孔子這位品德高尚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形象，實開啟正面研究儒學之先聲。此後同類的著作有：綜合性的如趙吉惠等《中國儒學史》、《中國儒學辭典》，劉蔚華等《中國儒學思想史》，龐樸主編《中國儒學》等；專題專經性研究，則有金景芳《學易四種》、《孔子新傳》（合著），劉起鈞《尚書學史》，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等，對儒家經學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總結。

特別是二十世紀後期，一批年青學人登上學術舞臺，在專門學術史研究方面做出可喜的成績，出版了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廖名春、梁韋弦、康學偉《周易研究史》，洪湛侯《詩經學史》，趙伯雄《春秋學史》，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姜林祥、王鈞林等多卷本《中國儒學史》，等等。真是後來居上，異軍突起，斐然可觀。這些著作既是對儒家學術史的研究，也是對儒學學科整體形態的呈現，為儒學學科的恢復提供了歷史的和學術的支撐，為儒學研究“春天”的到來廓清了迷霧。

三

放眼當今的學術界，中國儒學的命運已經有了很大改觀，一場“文化復興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開展，風雲際會，中國儒學學科建設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我們高興地看到，先是由民間自發組織，後是由政府主辦的“祭孔大典”越來越隆重，由國家出資興辦的“孔子學院”遍佈五洲四海，國內一些高等院校（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也紛紛成立儒學院（或國學院），一些有條件的高校還設立“中國儒學”博士點，正式公開招收儒學專業和以儒學為教學內容的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儒學這門古老而又日新的思想學術再度步入淑世濟人的大學校園，儒學研究、儒學教育以及儒學學科建設的問題再次被提到中華學人的關注視野和有關管理部門的議事日程。

1997年四川大學啟動《儒藏》編纂工程，在儒學文獻系統整理和獨立體系構建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四川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為適應儒學人才培養的需要，還籌劃和組織了“儒學教材”的編纂，一套全面反映儒家經典、儒學歷史、儒學思想、儒學文獻、儒學文化以及儒學文選的系列教材正在醞釀之中。它們的編成和出版，必將對儒學的復興和再度興盛起到積極的作用。

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曾經預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倒回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既然人類有此需求，儒學在二十一世紀也就有了復興的理由和希望。儒學學科的回歸和重振，應該指日可待，為期不遠矣！套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儒學復興“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儒學具有合乎人性、潤乎人心的系統理論，其追求社會和諧、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無疑具有超乎國家和種族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儒學自身具有兩千五百年的發展歷史，我們對儒學的再度復興沒有理由不抱樂觀的態度。

當然，這種可能也正如當年毛澤東同志所說只是“快要”而已，其間還有很長的路需要我們去走，包括對儒學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研究，對儒學成果進行完整的收集和整理，對儒學學科體系進行全新的重組和構建，等等。我們正在從事的《儒藏》編纂和研究事業，正是一部收集和整理儒學發展歷史和學術成果的大型叢書，它收錄了上自先秦、下至清末的儒學成果和史料，可為儒學的當代復興和發展提供最齊全的資料。

如果說《儒藏》反映的還是儒學古代成就的話，那麼這套“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則是《儒藏》的續編，它是一部收集和整理近代、現代儒學研究成果的資料寶藏。其作者包括部分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人，也有個別作者跨入了二十一世紀，但其成果主要發表在二十世紀之中。本文庫所收錄的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成果，上可與《儒藏》相銜接，下可啟二十一世紀儒學發展之新知。它是承上啟下的橋梁，也是溫故知新的土壤。

二十世紀，風起雲湧，世事變遷，靡有常態。大致說來，前半葉天造草昧，雲雷混沌，由於世勢日非，國是莫定，文化陵夷，儒學自然不振；後半葉處於新舊體制交替之中，缺乏經驗，文化重建創新不足，優秀傳統繼承不夠。整個二十世紀，除了改革開放後二十年儒學稍有重振氣象外，儒家與經學，不是被打倒和誣詆，就是被忽略和荒廢。幸而尚有一批有學識、有良知的老前輩，仍然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耕耘不輟，猶如萬綠叢中的一點丹紅，使傳統儒學領域尚存幾許生機，不致一片荒蕪。這是中國文化之幸，中國歷史之幸，也是後學晚生綿綿瓜瓞、薪火傳承之大幸！收集整理、總結研究這些成果，回想這些碩學大師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仍然堅守儒學的精神家園，其成果可資借鑒，其精神更是令人欽佩！後之繼起者，當以此為階梯奮力前行！





李源澄的生平事蹟及其學術成就(代序)

受業於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的近現代學者李源澄（1909—1958），是一位尚未受到當今學術界應有重視的蜀學大師。

目前所見的公開出版的李源澄傳記僅二種：第一種，四川省犍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犍爲縣志》之《李源澄傳》（以下簡稱爲“先生傳”），篇幅爲五六千字^①，爲記敘，中有數處不確之處，如生年錯誤；第二種，李源澄知交、學者賴高翔（1907—1993）所撰《李源澄傳》^②，雖僅二千字，却堪稱字字珠璣。二者內容有某些相似或相近之處。此外，在文章中對李源澄的生平稍有涉及的還有二種：第一種，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③；第二種，蒙默的《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等論文^④。事實上，李源澄生前曾撰有“自述”等珍貴文獻，可惜已經不存人間。根據李源澄好友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的記載，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李源澄迫於形勢，曾自撰“檢討書”，未寫完，於次年去世，李源澄在該“檢討書”自述“少年之生活及讀書、尋師、著作、訪友、任教之詳細經歷”，可惜這一珍貴文獻於今不知去向（《宓續》，第5冊，第120頁）；1958年5月4日李源澄去世後，家人迫於形勢，多次銷燬李源澄的遺物，如在1964年，將李源澄所遺物品，從先生“照像、信札、著述等，全部焚燬無餘”，以至於李源澄長女李知勉“並其父之生年月日皆不知云”（《宓續》，第

① 四川省犍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李源澄傳》（四川省犍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犍爲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717～718頁。

② 賴高翔爲蜀地名宿林思進（1873—1953，字山腴）高弟，20世紀80年代出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至去世。參見賴氏門生張學淵：《賴高翔先生傳》。賴高翔所著遺稿，十年浩劫中付炬者甚多，幸喜有《李源澄傳》、《蜀賢張真如先生傳》、《憶唐君毅教授》等多種今尚幸存而較完整，收入張學淵主編《賴高翔文史雜論》，全二冊，“川成新出內字〔二〇〇三〕第七七二號”，2004年6月“內部出版”。其中，《李源澄傳》載於下冊，第355～359頁。

③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載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6月版。

④ 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發表於西華大學、四川省文史館主編《蜀學》特刊第二輯，巴蜀書社，2007年11月版，第42～52頁；胡昭曦：《李源澄與灌縣靈岩書院》，載胡昭曦：《四川書院史》附錄（三），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4月版。

7冊，第334頁）^①。

本文在以上諸文獻的基礎上，採納相關研究成果，並根據《吳宓日記》等史料，在略述李源澄生平事迹之後，簡要評述其學術貢獻。

一 李源澄的生平事迹

李源澄出生於宣統元年夏曆五月二十日（1909年7月7日），去世於1958年5月4日，差兩個月滿50歲。簡要回顧李源澄的一生，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早年，1909年7月（出生）至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係求學、論學、研學時期

第二時期，盛年，1936年7月至1949年11月（重慶解放），係教學、治學、辦學時期。

第三時期，後期，1949年12月至1958年5月（去世），係教學、從政、被定為右派時期。

茲依據以上的分期，概括性地介紹李源澄的生平事迹如下。

（一）1909年7月至1936年6月，求學、論學、研學時期

先言李源澄之“求學”。

李源澄於宣統元年（1909）出生於四川省犍為縣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書香家庭。祖父富春，晚清秀才，授教於鄉里；父親昌緒，能文善書。昌緒育有子女四人，先生居長。李源澄幼年聰穎，跟隨祖父學習，故深得其喜愛；祖父的國學素養，家庭的氛圍，對於李源澄的成長，起了良好的作用。李源澄早年入學於榮縣“縣立中學校”。該校由近代著名國學大師、文學家、書法家趙熙（1867—1948）主持。李源澄在校學習成績優異，為諸師所重。1923年，李源澄參加榮縣“縣立中學校”會考，成績名列第一，約4年後畢業。

此後，李源澄的學業基礎，依次受學於蒙文通、廖平、歐陽漸、邵瑞彭（1887—1937）、章太炎等先生，尤其是蒙文通、廖平、章太炎三先生對先生的影響尤深。

1928年，李源澄考進“四川國學專門學校”，與蒙文通、伍非百（1890—1965）締結師生緣。時蒙文通以《經學挾要》為講章，大力提倡廖平經學，李源澄“得侍講席，甚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學者，源澄先生得聞其緒論而羨之”^②。故蒙文通的引導激發了李源澄對於廖平經學的興趣。1929年，

^① 《吳宓日記》，即1949年之前部分，共10冊，三聯書店1998年3月出版，本文簡記為《宓》；《吳宓日記續編》，即1949年之後部分，亦10冊，三聯書店2006年3月“內部出版”，本文簡記為《宓續》。

^② 蒙文通之子蒙默（1926—）語，見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載西華大學、四川省文史館主編：《蜀學》特刊第二輯，第43頁。

蒙文通介紹李源澄到井研縣向廖平求學。8月中旬，李源澄往井研縣廖平先生宅，登門學經約二月。時廖平已78歲，已在病中，不辭辛勞，悉心指教。10月，李源澄辭別廖平^①。

廖平之子幼平曾說：^②

李源澄先生到我家時，我正停學在家代父親照顧家務。因之我接待過他，並為他們安排過學習的地點和時間。但對他們請教的内容，却一無所知。可是，從表面上看來，父親不是系統地講經，而是解答疑難。他們在井研住了一兩月就走了。幾年後，父親去世了。

就這樣，李源澄在廖平處學習了約兩個月，成了廖平的關門弟子。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說：

時廖氏已老病不能講授，唯解惑答疑而已，前後略有數月，故源澄先生亦得及門廖氏。逾二年，廖氏卒，而源澄先生遂為廖氏關門弟子焉。

蒙默所謂的“而源澄先生遂為廖氏關門弟子焉”，最早應該源自蒙文通。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說：^③

先生弟子遍蜀中，……捷為李源澄俊卿於及門中為最少，精熟先生三傳之學，亦解言禮。……能明廖師之義而宏其傳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論廖氏之學者，儻在俊卿也。

可見，所謂“而源澄先生遂為廖氏關門弟子焉”之說，得到了公認。

1932年，李源澄到南京入“支那內學院”，追隨歐陽漸學習佛學、諸子、明代理學。

在求學之餘，李源澄開始了“研學”，即研究學術。李源澄的學術成果也以論文、論著的形式，在全國各大報刊、出版社問世。

1933年4月，李源澄在河南省圖書館主辦，河南省圖書館館長井偉生（字俊起）任主編的《河南圖書館館刊》發表《毛詩徵文》一文。這是目前筆者所見李源澄最早發表的學術論文。此後，李源澄在上海《學藝雜誌》、南京《國風半月刊》次第發表了《古文大師劉師培先生與兩漢古文學質疑》、《公羊穀梁徵序例》等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得以嶄露頭角。

1936年2月，李源澄第一部專著《諸子概論》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該書共130頁，書前有伍非百和盧前撰寫的序。《諸子概論》一書研究了先秦儒、

① 廖宗澤編：《六譯先生年譜》卷2，載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版，第82頁。

② 張學淵主編：《賴高翔文史雜論》，下冊，第359頁。

③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載廖幼平：《廖季平年譜》，第105～106頁。



道、墨、法諸家思想及其根源，並評論《論語》、《孟子》、《荀子》、《道德經》、《莊子》、《墨子》、《商君書》、《韓非子》等書的意義及價值。

在求學、研學的同時，李源澄爲了追求學術真理，展開了與師友、名流的“論學”。

先生“論學”的師友、名流中，有師輩的章太炎、蒙文通、柳翼謀（字詒徵，1880—1956）等人，名流中的胡適，以及友輩的陳柱、錢穆等人。

1935年3月，李源澄致函章太炎，就《春秋公羊傳》涉及的古、今文經學相詢，章太炎復函；之後，李源澄又函，章太炎再復。在復函中，章太炎雖然維護《左傳》，但並不薄《公羊》，主要以董仲舒等漢代經師和後代今文學家爲攻駁對象。10月，李源澄又致函章太炎，探討清儒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的利病，章太炎復函。一年之中，李源澄得與名家三通函，深受太炎器重，李源澄遂到蘇州，參加“章氏國學講習會”。講習會以“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爲宗旨”^①，門人朱希祖、諸祖耿（1899—1989）、徐復等充任講師協助教學；同時，出版《制言》半月刊，提倡“國學”研究，提倡讀經救國，一時社會影響很大，從者甚衆，可稱得上“盛況空前”^②。

又如前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所述，“丹徒柳翼謀反復與論學，稱其能傳師門之義”。所謂“丹徒柳翼謀反復與論學，稱其能傳師門之義”，指30年代李源澄與在南京主編的文史雜誌《國風》的柳翼謀先生論學，並得到其褒揚。李源澄亦有多篇論文在《國風》發表。

在30年代中，李源澄亦與老師蒙文通先生通函討論北宋變法、南宋和戰^③。

1935年12月、1936年5月，李源澄先後發表《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與陳柱尊教授論諸子書》二文，與友人陳柱討論諸子之學。1936年1月，發表《論老子非晚出書——並質錢賓四先生》，與錢穆討論《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

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之後，李源澄應江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文治之邀，任教於該校，講授諸子，從此開始了教學生涯。

在李源澄的求學時期，學業受蒙文通、廖平、章太炎三先生的影響最深。如學者賴高翔所說：“君（李源澄）之爲學，是根柢於蒙文通先生，遇廖氏而

① 《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見《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版，第960頁。

② 參見沈延國《章太炎先生在蘇州》以及湯炳正《憶太炎先生》，二文皆載於陳平原等編：《追憶章太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1月版。

③ 蒙文通：《與李源澄論北宋變法與南宋和戰書》，原載《論學》第五期，1937年5月江蘇無錫印行，茲據整理本，即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五卷《古史甄微》，巴蜀書社，1999年年8月版，第399～401頁。

深邃，經章氏而廣大。”^①

（二）1936年7月至1949年11月，教學、治學、辦學時期

這一時期，李源澄執教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蜀華中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民族文化書院、雲南大學、四川教育學院，甚至於參加或自辦書院、學院（西山書院、靈岩、五華、勉仁），足履無錫、北平、開封、遵義、昆明等地，與吳宓、唐君毅、竺可楨、巨贊法師、錢穆等交遊，發表了《白虎通義五經異義辯證》、《老子政治哲學》等大量論文，出版了《經學通論》、《秦漢史》等專著，並第一次將自己的學術論文結集為《李源澄學術論著初編》出版，基本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地位。因而，這一時期堪稱是李源澄一生的黃金時代。

先言李源澄的“教學”。

李源澄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的教學生涯，從1936年到次年7月，約一年整。

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從教之餘，1937年1月，李源澄在無錫，以個人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薪資所入，創辦了生平的第一種純學術期刊《論學》。第1期有《發刊辭》和論文5篇，李源澄除撰《發刊辭》外，還撰寫了《周秦儒學史論》、《新儒學派發微》等論文2篇。其它的文章還有陳兆年所撰《形聲釋例》等。《論學》在7月出版了第8期後，由於抗戰軍興之故，被迫停辦，李源澄輾轉返回四川。

李源澄以個人之力，獨自創辦學術刊物《論學》，揭開了李源澄主編報刊活動的序幕，為他以後創辦《靈岩學報》、主編《重光》月刊、參編《史學季刊》等報刊等積累了經驗。

如1946年10月，李源澄創辦了學術刊物《靈岩學報》，這半年刊只出版了創刊號（第1期）。由於有辦報刊的豐富經驗，在經費有着落的前提下，李源澄一人辦《靈岩學報》顯得遊刃有餘。該刊創刊號共有32頁，刊發了六篇學術論文。除了李源澄親撰《天人合一說探源》一文之外，還有蒙文通撰《黃老考》、《楊朱考》，王樹椒的遺著《論兩漢魏晉用人標準之不同》，唐君毅撰《佛學時代之來臨》和張德鈞撰《胡子知言發微》。這些作者除了王樹椒英年早逝之外，其餘的都是當時有一定影響的學者。

1937年底李源澄返回四川後，在成都任教於蜀華中學及四川大學。此後，先生依此執教於四川大學、浙江大學、民族文化書院、雲南大學、四川教育學院等校，以及參加或自辦書院、學院（靈岩、五華、勉仁）。

李源澄在高校主要教授上古文化史、中古史（含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等）、思想史、經學通論等經史課程，^②因而，《經學通論》、《秦漢史》等專著，

① 賴高翔：《李源澄傳》，載張學淵主編《賴高翔文史雜論》，下冊，第356頁。

② 參見李源澄先生《覆巨贊法師書》，原題為《浙大教授李源澄覆巨贊法師書》，載《獅子吼》月刊第1卷第2期，第31頁，1941年1月。





即在他研究、授課基礎上產生：他 20 世紀 40 年代初在四川大學講授經學，因有《經學通論》之作，其言治經要義皆集於此，雖全編不過四萬言，而其議論則頗精湛且與時賢不同；他 40 年代中期在靈岩山的書院教學之餘，潛心撰述了古代史研究專著《秦漢史》，得到了好友、曾在北大教過秦漢史的錢穆的高度評價，稱贊李源澄“殆今之所謂善讀史耶”，該書“則亦章氏所謂圓而神之類也”，以章實齋所認為的史學研究的最高境界——“圓而神”來推崇《秦漢史》研究的精深宏卓，可謂評價甚高。

再言李源澄之“辦學”。

李源澄的一生，主要貢獻在於國學研究及教育事業，因而，他在辦學上頗有作為，不僅積極參與五華、勉仁等書院的創辦，而且親自創辦了“靈岩書院”。

1945 年春，李源澄從西山書院辭教職返回成都後，於四川灌縣城外北靈岩山，藉助住持釋能清（1893—1964，郫縣金龍寺隆印和尚之弟子）、傳西法師（歐陽競無先生的弟子）之力，於靈岩寺創辦“靈岩書院”。直到 1947 年秋，因經費匱乏難以為繼而停辦^①。

在兩年多的辦學期間，為了教育好學生，李源澄特別注重師資，邀請太炎弟子傅平驤（？—2004）等人任教。

首批學生約有十名，後漸增加到數十人。學費為大米一石。書院授學程度從初中到大學，主要講習經、子、史及《文選》。蒙文通不僅非常欣賞，而且積極支持書院的事業，亦送哲嗣蒙默入書院就讀。李源澄並讓胞妹培華、胞弟源委，傅平驤也讓自己的子女到書院讀書。李源澄繼續講授在四川大學執教就已講授的《經學通論》，以及主講《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等儒家經典。

李源澄對於學生，愛若子女。靈岩書院崇慶縣籍學生鐘元靈，家境清貧而好學，李源澄不僅免去鐘的學費，並以自己所得稿費，資助其伙食。

除了定期辦學之外，為了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到書院學習，李源澄還在 1946 年夏季開辦了“靈岩書院暑期講習會”。“講習會”學習期為暑假的兩個月時間。報名來“講習會”的學生，約有 20 餘人。李源澄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來“講習會”作短期講學，雖學派有異，却彼此尊重容納，大抵與章氏論學態度有關。同時，使書院學生在篤學傳統文化之外，更得博聞百科之學，廣知全世界人類文化的精神財富。如當時哲學家、哲學史家唐君毅（1909—1978）為內遷重慶的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即應邀前來講學十餘天。

應邀前來講學的還有潘重規（1908—2003）、賴高翔、饒孟侃（1902—1967）、牟宗三、謝文炳（1900—1989）、朱自清（1898—1948）、錢穆、張敷

^① 四川省灌縣志編纂委員會：《灌縣志》第十七篇《教育·科技》的第一章《教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

榮（1904—1998）、周輔成、秦佩珩（1914—1989）、羅念生（1904—1990）、劉盛亞（1915—1960）等。

1946年夏秋之際，靈岩書院開辦暑期講習會，延請名師，創辦學術期刊，影響日益擴大，這一時間，書院進入了鼎盛時期。

隨着1947年6月內戰的全面爆發，靈岩書院好景不再。在渡過了鼎盛時期，開辦了兩年多的書院步入了困境，並於1947年秋停辦。

靈岩書院辦學雖不足三年，但是在社會影響、人才培養等方面的貢獻與影響，得到了當時及後世的稱道。

如靈岩書院清新的辦學理念、自由的講學風氣，為造訪者所贊賞。創辦“明道工讀學校”的湖北知名人士張銘，後來回憶道：當時，有一股“辦書院的熱潮，如同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在峨眉山上立書院，聽他講學的人都是大學畢業生。川大教授李源澄在灌縣青城山設書院，我親自去青城山訪問過，覺得他們那裏沒有國民黨團的干擾，講學自由風氣好。所以，1946年我自四川歸來後，就做植桐辦學的準備，開始打算叫明道書院”^①。

在靈岩書院追隨李源澄的學生，後來成名成家的有多人，可謂是為西南地區培養了一批人才，如王德宗（1924—）、屈仲樵（1924—1997）、王家佑（1926—）等。此外，書院的其他學生，也成為了大學教輔人員（如李源委，1949年後任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職員）、中小學教師（如前面提到的先生資助過的鐘元靈，“家境清貧而好學”，畢業後回崇慶縣教書到20世紀60年代去世）等各行業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李源澄從1947年秋與傅平驤到達雲南昆明，在雲南大學執教。任史學教授，並兼錢穆主持的“私立五華文理學院”的教授。

從1948年到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李源澄主要在重慶“私立勉仁文學院”、“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二高校執教。

約1948年2月，李源澄從昆明回到了成都。並協助梁漱溟在重慶北碚溫泉松林坡“勉仁國學專科學校”（1946年8月創設）的基礎上，創辦“私立勉仁文學院”，任教務長和歷史系教授。

李源澄在勉仁文學院執教及擔任教務長期間，積極主張兼收博覽，故除了梁漱溟思想體系外，亦積極建議延聘吳宓等著名學者，並在本年親自延聘了吳玄講西方美學，傅平驤、羅庸先生（1900—1950）講中國文學。傅平驤係從貴陽師範學院延聘而來。兼課教師又有方敬（1914—1996）等人。李源澄在勉仁文學院教授的學生，後來成才者有多人，如靈岩書院弟子王德宗，也來勉仁文學院就讀；1948年就讀於文學院歷史系的張拱卿（1926—），後來成為了重慶



李源澄的生平事蹟及其學術成就（代序）

^① 張銘：《我和明道工讀學校》，載湖北省蒲圻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蒲圻文史資料》，第三輯，1987年，第74頁。

圖書館古籍鑒定專家^①。

1949年，李源澄兼任重慶“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史地系主任。吳宓約李源澄等，籌備在江津吳芳吉（碧柳，1896—1932）舊游之地創建“白屋書院”，但是，11月30日重慶解放，因而“白屋書院”未得成立。李源澄作為民盟的一員，在重慶積極迎接解放。

（三）1949年12月至1958年5月，教學、從政、被定為右派時期

重慶解放後，李源澄仍任教於四川教育學院，直到1950年8月四川教育學院、女子師範學院合併成為“西南師範學院”（後改名西南師範大學，今西南大學），李源澄就任西南師範學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職，同時被任命為副教務長，直到1957年，並在該校工作到去世。吳宓等人亦成為西南師範學院教授。

解放之初，李源澄工作熱情甚高。

據李源澄的學生石瓊生回憶^②：“李源澄先生隨校遷北碚後，政治熱情高，工作積極，講話言簡意賅，頗受學生歡迎，和當年上第一堂課對我們講話時的情景完全兩樣，且早就參加了民盟。”

臨近解放時，李源澄開始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如《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法蘭西內戰》等，常至深夜，興趣盎然。解放後，先生在形勢的推動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書籍的積極性更高，並於1951年在《成都工商導報》發表了《學習〈實踐論〉後對歷史學的體會》一文，這是解放後先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新中國時期，李源澄未發表專業的學術論文，只是對自己在魏晉南北朝史等研究的成果進行了整理，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而這一時期，李源澄的主要工作可以歸納為兩點：教學、從政（最終在1957年被定為右派）。

以教學而言，李源澄以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之職，在學校講授中國古代史等課程；同時，就任為學校的副教務長，直到1957年。

李源澄諳悉儒經，素有濟世、入世之心，密友、知交賴高翔先生說：“君本懷濟世之志，時時欲有所為。予嘗諷以徐孺子所言，以為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持，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君怫然謂此乃玩世不恭，非聖賢憂世救溺之意”^③。這是先生從政的思想基礎。

李源澄從政，表現在：第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於1955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第二，擔任了行政職務，因而經常勸說同事，這在“思想改造運動”時吳宓有記載。

^① 《梁漱溟全集·書信卷》收錄有梁漱溟致張拱卿的3封書信。又可參仇崢：《張拱卿60年看書20萬冊還嫌少》，《重慶晨報》2006年11月20日。

^② 石瓊生：《跋磁器口紀事》，見張紫葛：《心香泪酒祭吳宓》，廣州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448頁。

^③ 賴高翔：《李源澄傳》，《賴高翔文史雜論》，下冊，第358頁。